

中国大陆唯一授权 畅销百年励志经典

THE STORY OF MY LIFE


我的生活

海伦·凯勒自传

[美]詹姆斯·伯杰 选编

常文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K837. 12/287

2007

我的生活 *Helen Keller*
海伦·凯勒自传

[美]詹姆斯·伯杰 选编

常文祺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 / [美] 海伦·凯勒著；
[美]詹姆斯·伯杰选编；常文祺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6(2007.7重印)

ISBN 978-7-5339-2489-8

I. 我... II. ①凯... ②詹... ③常... III. 凯勒, H.
(1880-1968)自传 IV. 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5176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06-62 号

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	
[美] 海伦·凯勒 著	
[美] 詹姆斯·伯杰 选编 常文祺 译	
责任编辑 鲍 娴 朱怡瓴 装帧设计 王 坚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310006 网址：www.zjwycbs.cn 电邮：zjlaph@mail.hz.zj.cn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1230 1/32 字数：350 千字 插页：1 印张：12.5 印数：10001-16000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489-8 定价：24.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是美国兰登书屋独家授权的 1903 年版复原版，是中国大陆唯一授权版本。

海伦·凯勒是20世纪美国的传奇人物。她在世间生活了八十八年，有八十七年的光阴被幽闭在黑暗的世界里，却以其独特的方式书写了生命的神话。她的自传《我的生活》被誉为“世界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杰作”，译本超过百余种，堪称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传记，是丘吉尔、马克·吐温推荐的励志经典。

阅读它，您的人生将由此而改变。

The Story of My Life



Compilation, preface, endnotes, and discussion
guide copyright © 2004 by Random House, Inc.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odern Library, an imprint of Random House Pub-
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目 录

编者序言:被尘封的教育履历/詹姆斯·伯杰	1
致谢感言	34
导读	35
初版序言	39
卷一:我的生活	41
卷二:书信集(1887—1901)	153
卷三:关于海伦·凯勒的生活和教育的补充说明	247
附录一:选自《我生存的世界》	385
附录二:选自《走出黑暗》	389

目
录

编者序言

被尘封的教育履历

詹姆斯·伯杰

海伦·凯勒的这本《我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本“复原版”的“百周年纪念”出版物，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海伦·凯勒是美国文化历史上“最知名”和“最少被人了解”的人物之一。在她所创作的十四本书当中，《我的生活》最为著名。每一个人都知道海伦·凯勒的传奇故事，很多人都把她当做一个圣徒、一个奇迹来看待；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凯勒应该是一个思想家、作家、社会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事实上，她确实是一个活跃的社会主义者——尽管这一点被人们久久遗忘了。同样，不计其数的人都读过某些版本的凯勒自传——这些早熟而令人鼓舞的文字是她对自己头二十年生命历程的回顾。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部自传只是某部书的前三分之一而已，1903年，这本书由双日出版公司^①出版，它的书名和完整副标题是：《我的生活——海伦·凯勒自传及其书信集(1887—1901)，以及有关她所受教育的补充说明，包括她的老师，安妮·曼斯菲尔德·苏立文的教学报告和书信内容，全书由约翰·阿尔伯特·麦西编著》^②。如

编者
序
言

^① 这里的双日出版公司是俗称，实际上，这家公司应该叫道布尔戴出版公司。这家公司是美国出版家弗兰克·纳尔逊·道布尔戴(1862—1934)于1897年创建的。——译者注

^② 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是 *The Story of My Life, by Helen Keller, with Her Letters (1887—1901), and a Supplementary Account of Her Education, Including Passages from the Reports and Letters of Her Teacher, Anne Mansfield Sullivan, by John Albert Macy*, 事实上，这也是本书(2004年版)的全称，只是后面加上了“选编及序言/詹姆斯·伯杰”。——译者注

今,人们至少可以见到十个版本的海伦·凯勒自传,但是最完整的版本当属1954年的重印版,自那以后,这个版本就在市面上绝迹了。

重读《我的生活》的原始版本为什么如此重要?当然,我们都知道,海伦·凯勒的生活也是一种(与他人)合作的生活。1887年,安妮·苏立文来到了凯勒在亚拉巴马州图斯康比亚的家(当时,海伦七岁,安妮二十一岁),自从那时开始,海伦就是通过别人的眼睛、耳朵和语言来感受世界的。从广义上讲,所有人的生活都是相互协作的结果,因为我们不能孤立存在,如果没有充足而持久的外界知识——比如口口相传或出版物——的介入,我们是无法了解我们身边的世界和我们的内心世界的。对于凯勒而言,来自本能的协作意识尤其强烈;整整七十年,她总是会遇到“把世界拼写在她的手上的人”。

就其“完整性和协作形式”而言,《我的生活》不仅仅是一个年轻盲聋女性的自传。这本书描写了一段极其特殊的教育,它是关于一个年轻女性生活状态的记录——她如何被剥夺了感官功能,从而失去了接触社会的能力;她又是如何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体系,并且通过语言进入到“自我认知”的世界的——在这个世界里,她了解到了社会的相互影响、道德良知,以及最广泛的人类情感。

本书的第一卷,也就是自传部分,至今仍是一本销量很大的读物。在这部自传中,海伦对她自己的生活进行了回顾——她如何从一个孤立无助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青年女性。随后,在本书的第二卷中,从凯勒自八岁时写的书信开始,我们看到了她一年年,甚至是一周周的成长历程。在她那令人惊异的语言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她的认知感不断地得到强化和加深,其中包括她的情绪变化、伦理道德的建立,以及审美趣味的形成。作为小女孩的海伦告诉我们,或者说向我们表明,一旦海伦长大成人,有很多事情反而不如童年的经历值得回忆。在本书的第三卷中,约翰·麦西就凯勒的性格特征、教育背景、表达能力,以及写作风格给予了全面的评价。

综观全书,有关凯勒接受教育的文字具有特殊的价值,它受到的关注度也最高。因为其中包括了安妮·苏立文的大量书信,这些写于1887年到1894年的书信记述了她最初七年的教学生涯。对于大

部分读者而言,苏立文的书信无疑具有一种揭示效应。即便是一个对海伦·凯勒不太关注的人,也会对安妮·苏立文赞赏有加,因为他们大都看过由安妮·班克罗夫特^①主演的影片《奇迹创造者》(摄于1962年)。这是一本不同凡响的著作,你可以直接从一系列的信件当中“听到苏立文小姐的声音”;你可以感受到她在海伦身上所付出的心血;你也可以看到胜利、挫折,以及这对师生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当然,凯勒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无双的,她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人文精神的思想家,也是一个气质优雅的作家。而(本书的编著者)约翰·麦西,则是一个令人尊敬的文学评论家,他的睿智和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在这本书(1903年初版)出版后不久,他就和安妮·苏立文结婚了。和文学评论相比,苏立文小姐的言论显得更加机敏睿智而充满感情色彩。苏立文是一个斗士,在她的性格当中,确实有那么一股子“不屈不挠的劲头”。她并不是一个圣人,一个传奇,或者一个哈佛毕业生;她有着辛辣而极具批判精神的幽默感,而且,在任何时刻,她的文字都不乏真知灼见。事实上,苏立文并没有自己的著作,但她也许是凯勒的三个“合作者”^②中最出色的作家。塞缪尔·克莱门斯^③是曾帮助过凯勒的众多名人之一。在看过《我的生活》后,他是这样评价苏立文的:“她写的那些信是多么地卓尔不群!她的文笔深刻而富有才情,充满了独创性和思辨精神——简直无懈可击。”^④而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曾在写给苏立文的信中说:“你为什么不跟我们说说你写给霍普金斯夫人的那些信?……它们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在对海伦进行早期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信件将会变成一种标准,一种对你的教学具有指导作用的原则,同时,它们也是所有教师应该信守的最重要的原则。”

① 安妮·班克罗夫特,好莱坞女演员,曾在《奇迹创造者》一片中饰演了安妮·苏立文,该片使她荣获了第三十五届(1962)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

② 这里的“合作者”特指对海伦·凯勒有巨大影响的人。——译者注

③ 这里的塞缪尔·克莱门斯指的就是马克·吐温。——译者注

④ 选自约瑟夫·P.拉什的《海伦和老师:海伦·凯勒和安妮·苏立文·麦西的故事》一书,纽约,Delacorte出版社,1980年版,第290页。——原书注

苏立文和麦西

安妮·苏立文(1866—1936)是一个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家庭的女儿。她八岁时就失去了母亲。两年以后,她那暴戾、酗酒成性的父亲抛弃了安妮和另外两个孩子。1876年,安妮和她的弟弟吉米被送进了马萨诸塞州丢克斯伯里的救济院。吉米因患髋骨结核病而成了跛子,安妮的视力也因沙眼症而受到了严重伤害。进入救济院不到三个月,吉米就病死了。安妮并没有被命运击垮,在丢克斯伯里住了四年后,她终于获得了一笔奖学金,从而得以进入波士顿的帕金斯盲人学院就读。尽管她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学生,但是,她那持久的愤怒感仍然难以消除——她被家人的遗弃,她兄弟的死亡,使得她在求学期间形成了一种抗拒心理和毫不妥协的个性。此外,苏立文强烈地感到,或者说,是被迫感受到了自己和帕金斯学院的其他学生之间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但是,在老师玛丽·摩尔和芳妮·玛莱特的帮助下,在女舍监索菲娅·霍普金斯夫人的呵护下,以及在帕金斯学院院长迈克尔·阿纳戈诺斯先生的支持下,苏立文的学业成绩十分出众,她尤其擅长文学课程的学习。1886年,她以学生代表^①的身份在毕业典礼上做了致词演说。在帕金斯学院求学期间,一连串的眼科手术保住了她的部分视力,但是时断时续的眼疾终身困扰着她。

在她毕业后的来年夏天,阿纳戈诺斯推荐她作为海伦·凯勒的家庭教师,于是,她开始了其一生颇不平凡的教育事业。当时,苏立文很快便认识到,她所从事的是一项意义重大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工作。1887年5月,她致信索菲娅·霍普金斯夫人,信中写道:“我深知,对这个孩子的教育将使我的生活变得不同凡响,前提是,假如我有这样的头脑和毅力去实现它。”一个月之后,她又写道:“我内心里

^① 这里的“学生代表”,原文是“valedictorian”,这个词特指“在毕业典礼上做告别演说的,于一个班中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学生”,由此不难看出苏立文学习成绩的优秀。——译者注

的一些想法告诉我,我一定会实现梦想的……我知道她有着出众的能力,我相信,我能够开发和塑造她的自身潜力。我无法告诉你我怎么会有这些个想法,我对如何开展工作也没有什么头绪;我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知道做这些事情的意义。”

约翰·麦西(1877—1932)出身在底特律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尽管这个家庭的先人是贫穷的楠塔基特岛^①捕鲸人。他依靠奖学金进入哈佛就读,而且学习成绩优秀。读书时,他是才华横溢的“班级诗人”,《哈佛立场》的主编,还是《讽刺》杂志的助理编辑。1899年毕业时,他成了哈佛的一名讲师。后来,通过别人的引荐,他认识了凯勒和苏立文,并且做了这对师生的编辑。他主要是把凯勒为《女士之家》杂志撰写的一系列自传性文章重新编辑成书。通过学习,麦西很快就可以用手语字母同凯勒进行交流了。在此期间,他和苏立文之间发展了一段浪漫情愫。苏立文三十八岁时,麦西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二十七岁青年。根据凯勒的传记作者多萝西·赫尔曼恩的描述,她对两人的浪漫关系和婚嫁问题并不看好。她暗示读者,更合乎情理的关系应该发生在麦西和海伦之间。然而苏立文和麦西分享着同样的事业和思想观念;当然,他们也在“分享”海伦,他们爱海伦,他们越了解海伦,也就越了解彼此。但是,麦西和苏立文的婚姻关系并不长久。他们于1905年结婚,尽管他们从未离婚,但是在1914年,两人的婚姻实质上已经解体。在两人分居后,麦西同一名叫麦拉的盲聋女雕刻家发生了一段恋情,他们还有一个女儿。遗憾的是,有关麦拉其人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人们只知道她在生下女儿五年后就死了。

在对《我的生活》进行了大量的编辑工作后,麦西又帮助凯勒完成了四本书(的编辑),同时,他还作为凯勒的代理人同出版商进行交

① 美国马萨诸塞州沿海岛屿。——译者注

涉。而麦西自己也有著作问世,包括一部埃德加·爱伦·坡^①的传记(1907),《美国文学精神》(1913)和《社会主义在美国》(1916)。此外,他还是《青年伴侣》(杂志)的副编审和《民族》(杂志)的文学编辑。他曾是信奉社会主义思想的市长乔治·R. 鲁恩的秘书,正是通过约翰·麦西的介绍,海伦·凯勒最终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

海伦·凯勒的求学之路:在语言的世界里上下求索

在海伦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不管苏立文和麦西有着怎样的贡献和才干,我们的注意力还是要回到海伦·凯勒身上来。海伦·凯勒在十岁时就名扬世界了,在其后的一生中,她始终是一个公众人物;甚至在她去世多年后,她仍然是一个为世人所景仰的对象。事实上,从孩童时代起,她就被视为一个智力超群的天才和一个道德楷模。于是,她的生活就变成一种传奇。虽然又聋又瞎,她还是学会了语言——而且学得是那么出色,她是英语学士,拉德克利夫学院的优等生,写过十四本书。此外,如果把自身的感官缺陷和外界的过度褒扬排除在外,她几乎会给所有认识她或遇到她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一个极其乐观、善良的人;她慷慨豁达,具有一种近乎神圣的人格魅力。塞缪尔·克莱门斯说凯勒是他所遇到的最不平凡的女性,也可能是自圣女贞德以来最不平凡的女性^②。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曾这样评价凯勒:“她比我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要优秀。”玛莎·格雷厄姆^③曾在自己的一段舞蹈中表现过凯勒的勇气,她是这样评价凯勒的:“她决不允许利己主义在自己身上存在,更不会让这种心

①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美国作家,西方现代侦探小说的鼻祖,代表作有诗歌《乌鸦》(1845)和短篇小说《厄舍大宅的倒塌》(1839)等,其文风带有哥特文学传统的诡异色彩,对后世西方文学有重要影响。——译者注

② 见多萝西·赫尔曼恩的《海伦·凯勒:一种生活》,纽约,Alfred A. Knopf 书局,1998年版,第102、107页。——原书注

③ 玛莎·格雷厄姆(1894—1991),美国舞蹈家,编导,现代舞的开创者之一,于1930年在纽约创建了舞蹈剧场,其作品包括《阿巴拉契亚的春天》(1944)和《克莱特曼斯》(1958)。——译者注

理妨碍自己的生活；她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她是上帝的见证者。”还有旁观者感觉“好似看到了一个洁净而完美的灵魂……这是一种对尔虞我诈和痛苦悲伤无知无觉的造物……一种孩童般的本真性情的流露”。可以说，这样的评价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总之，海伦·凯勒已经成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偶像，她向我们展示了精神、道德，以及人格发展的至高境界。

当然，就凯勒的残疾程度和她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言，这些溢美之词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狂热的崇拜情结还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的。事实上，海伦·凯勒的故事主要说的是她如何掌握语言的过程。就在她咿呀学语的时候，疾病夺走了她的视力和听力。在其后的五年间，除了一些自发性的指示物体和家人的手势，她没有说过一个字。她生活在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里。当然，这个“世界”也剥夺了她了解社会、接触社会的权利。后来，通过近乎神奇的手段，她掌握了语言，这才得以进入现实世界。凯勒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她从非语言的世界走进语言的殿堂，这使得她有了同人类社会漫长历史进行“对话”的机会。从人类社会最久远的神话传说，到最新的神经学和大脑进化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种经久不衰的魔力——这种魔力就存在于语言和非语言的边界之上。在《创世记》中，上帝造物结束之后，亚当为世上的动物命名，《米德拉西书》^①中的注释说，亚当展示了天使所不具备的语言天赋。“他的智慧远胜于你们。”上帝对众天使说道。根据《吉尔伽美什》^②史诗的描述，当吉尔伽美什的战友恩吉杜学会了语言之后，他就再也不能管理动物了。

特伦斯·迪康是进化生物学家，也是《物种符号》一书的作者，他认为语言不仅仅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事实上，在使用符号能力方面，人类的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都会对大脑的构造产生影响。当然，这是一种有益而积极的影响。总之，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自然选择来完

① 这是犹太人对希伯来《圣经》的讲解布道书，编纂于公元400年到1200年之间，主要根据《圣经》中的寓言以及犹太教法典中的传说而写成。——译者注

② 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这个国王是神话史诗中的英雄人物。——译者注

成的。大脑结构越复杂,其扩展语言的能力也就越强。这样,通过自然选择和遗传转换,大脑结构会变得越来越适合语言表达。换句话说,语言 and 大脑是共同进化的伙伴。正如迪康所指出的那样,不同于人类,其他动物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进行交流。长尾黑颚猴会以一种特定的嚎叫提示同类“天上有一只鹰正在逼近”,而另一种嚎叫则预示“地上来了一只美洲虎”。不过这类叫喊还不能称为语言。迪康认为,猴子的每一次嚎叫都是一种“标记”,它会在特定的时刻指向特定的物体,而且从来不会在没有对象的情况下使用。这种“标记”是一种锁定对象的表示,很多动物都具有这种能力。虽然用处广泛,但是这种“标记”并不是一种“符号”,因为“符号”并不仅仅固定在一个对象上,“符号”的含义也不是唯一的,它能制造双关语、抽象含义、虚构情节,还有谎言。千百万年,进化过程就是这样将我们原始祖先的“标记”转化为具有丰富含义的“象征符号”的。^①

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海伦·凯勒便经历了这种从“标记”到“语言符号”的转变。安妮·苏立文很快就教会了凯勒使用手语,同时,她开始把相关物体的单词拼写在凯勒的手上。然而,正当海伦的单词越学越多的时候,苏立文却在1887年3月做了这样的评价,她(凯勒)“并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凯勒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她混淆了“杯子”(mug)和“水”(water)这两个单词。在她看来,它们似乎并无区别:容器和里面的东西就是一体的——她无法理解“水”能够脱离“杯子”而独立存在。实际上,她的意识正在进行着一种“按图索骥”的转换过程。既然有了“盛了水的杯子”(mug-of-water),那么,水同其他对象的关系就需要用一些符号来表示。终于,1887年4月

^① 迪康的理论主要来自于美国哲学家查尔斯·桑德斯·佩尔斯(1839—1914),佩尔斯也提出过“第三种符号”之说。同“标记”和“象征”相比,这种符号更加初级。事实上,这是一种意图明确的符号,比如,宗教符号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神性的真实化身。迪康认为,最原始的动物只会通过“定向形象”来感知世界:每一种事物都是其本来的面目的直接反映,这种唯一性使它同其他事物有了显著区别。因此,它也就不能作为其他事物的代表了。关于语言进化的另外几种生物学观点可以参见史蒂文·平克,安乐尼·达默西,以及杰拉尔德·伊德蒙的著作。——原书注

5日,在那个著名的“井旁取水”事件中,“神秘的语言世界展现在我面前”,于是,她领会了,或者说是开始领会了词语既具有共性又具有特性的概念。因此,不管是杯子里的水、井里的水,还是河流和海洋里的水,都可以用“水”这个单词来表示。而一个“杯子”既可以盛水、盛牛奶,也可以盛柠檬汁,虽然世界上有许多不同形状和大小的杯子,但是它们统统地被叫做“杯子”。

就这样,海伦掌握了学习语言的关键——表示事物的词语会以共性和特性两种方式存在。不过,对于完全抽象的词语又该如何学习呢? 1888年10月,苏立文在提交给帕金斯学院的教学报告中写道:“我不停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你怎么才能把“智慧”和“道德品质”这类富有表现力的词教给她呢?’”苏立文认为,像“爱”、“好”、“坏”、“愉快”、“伤心”这类抽象词语是可以被传授的,只要在同对象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地重复和使用这些词。事实上,她自己就是这么做的。当然,只有在完整的语言环境和实际应用中,当事人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些词语的含义。海伦试图把“爱”这个词同某件事物联系起来——一束鲜花和它们散发的香味,太阳和它那温热的气息。几天后,当她在学习上遇到了难题的时候,苏立文就在她的额头上拼写了“想”(think)这个词。于是,凯勒第一次懂得了“这个词语就是我头脑运行过程的产物,这是我对一个抽象概念的初次认识”。自此以后,情感、观念和各类词语在海伦眼里都变得具体而明朗起来。“真理之美蓦然出现在我的头脑里——在我的灵魂和其他人的灵魂之间,延伸出一条条看不见的连线。”这些语言之线是真实可靠的,它们就像一张无比巨大的网,将我们同他人紧紧连接起来。

凯勒终于明白,抽象术语的含义是根据语境来决定的;正如她在自己的第三本书《我生存的世界》(1908)中写到的那样,对她而言,颜色就像“希望”、“理想主义”、“一神论”、“理性”这些词一样抽象。然而,当她谈到“红色”和“蓝色”时,就像她谈到“上帝”或“正义”一样容易,因为她知道这些词是如何在语言中运用的。“联想的力量使我想说,白色是高尚而纯洁的,绿色是丰沛繁茂的,而红色喻示着爱、羞耻或者力量。”作为一个盲聋人,她会把人们直截了当说出的话用隐喻

表现出来。“我知道这些话是隐喻,但我还是要加以求证,因为在我们的语言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它……因为我能理解‘反射’这个词,一面镜子决不会把我搞懵。”

海伦·凯勒从语言世界之外进入到语言世界内部的独特经验表明,我们自身就是一种能思维、懂语言的社会动物。事实上,无论人类是否出于个人目的而创立了语言,在科学和哲学的众多分支学科内,这始终是一个值得研究和争论的话题。神经学家安托尼奥·达马西奥是这样描述语言进化的:人类最初的意识是非语言的,语言诞生的关键因素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种“扩充意识”——这种意识会赋予我们某种能力,也会把我们的生活变成一段故事。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种从幼年到童年再到成年的“语言转化”过程。但是也有例外发生——比如像海伦·凯勒——就是一个最令人关注的典型。欧洲启蒙主义^①思想认为,“野性难驯”的孩子需要被特别地“唤醒”。这些孩子似乎扮演了一种从自然过渡到文明的社会角色,这当然会引起人们广泛的思索,比如,人的属性是先天存在的还是社会造就的,它是否会随着社会的兴衰而起伏。社会学者菲利比·皮奈尔曾在1800年写道:“研究人类的性格成因是很令人兴奋的事,你可以发现是非观念和道德情操的因果关系,而这两者是独立于社会化进程之外的存在物。”^②“野孩子”为我们提供了检测人类自然属性的契机,虽然这样的研究并不一定会产生明确的结果。慈祥而宽厚的卡斯帕·豪瑟似乎更加应和了卢梭^③的“人性本善”观点,他被一个目击者描述成“一个驳斥原罪说的活见证”^④。与此同时,“阿威农的胜利者”^⑤则令

① 这里的“启蒙主义”即“欧洲启蒙主义运动”,这股肇始于18世纪的哲学思潮强调运用理智来审视先前被接受了的信条和传统,该运动带来了许多人道主义变革。——译者注

② 选自哈伦·莱恩的《阿威农的野男孩》,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58页。——原书注

③ 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主张人的本性是好的,但被社会腐化了。主要著作有《民约论》和小说《爱弥儿》。——译者注

④ 摘自杰弗里·穆萨耶夫·马森的《消失的王子:神秘的卡斯帕·豪瑟悬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原书注

⑤ 这里指一部作品中的某个人物的代称。——译者注

一位观察家心生感慨：“天性……就是一种不足道哉的未开花状态”，而且，“相对于天性而言，文明社会只会导致人类的道德优越感”。

时至今日，关于“野孩子”的争论仍然是个令人着迷的话题。当代悲剧事件“吉妮”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叫吉妮的洛杉矶女孩被她的家人强行隔离起来，于是，她生活在一个没有语言的环境里，直到1970年，她才被儿童福利机构的官员们解救出来，当时她已经十三岁了。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愤慨；同时，它也令心理学家和语言学家展开了学术角逐——他们想以吉妮为例证，并以此来支持或反驳语言进化理论。最终，正如诺姆·乔姆斯基^①指出的那样，吉妮变成了“一个天然的试验品”^②。幸运的是，这样的试验可遇不可求。事实上，“野孩子”总是与哲学的美梦作对，正如杰弗里·马森所观察到的一样，“野孩子”是一种放任和虐待的附属物。总之，在至关重要的启蒙阶段就被剥夺了语言功能的孩子，即使将来发展出了语言技能，也是有所缺失的。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信息让我们了解到语言学和社会界限的两面性，据此，你就可以对两者的优劣做出判断。通过对令人着迷的“野孩子”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判断或检测出自身文化的价值。因为在进入语言世界的过程中，“野孩子”的意识是被重新塑造的；当他（她）逐步进入到标准的语言模式时，他（她）也就变成了一种文化的“完美作品”。就是说，无论他们怎么变，也不会跳出我们为其制定的方向。莎士比亚可能是第一个认识到“语言是用来检测文化”的人，正如他笔下的典型人物凯列班^③说的那样：“你传授给我语言，我便得着大利益／瞧，我知道如何诅咒了。”而玛丽·雪莱^④则进行了

① 诺姆·乔姆斯基(1928—)，美国语言学家，他在《句法结构》(1957)一书中所阐述的关于生成语法的理论曾使语言学研究发生突破性进展。——译者注

② 选自拉斯·赖默所著《吉妮：一个逃离沉默世界的受虐儿童》，纽约，哈珀·柯林斯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38页。——原书注

③ 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半人半兽怪物。——译者注

④ 玛丽·雪莱(1797—1851)，英国作家，以其哥特式小说《弗兰肯斯坦》最为著名。她与大诗人珀西·比希·雪莱于1816年结婚。——译者注